

“中国最后一位探花”不满腐败辞官 卖字为生

商氏家族十代从军，当时驻防广州的八旗部队有几万人，晚清时期因朝廷拨款大幅度减少，大多家族陷入困顿的境地，商氏家族也不例外。但是从商衍瀛、商衍鎰开始，商氏家族步入从文之路的正轨，并成为文化望族。

文脉得以相传数代，商家后人总结，那是因为商家“不喜做官，钟情学术研究”，保持了商家人精神上的独立性、品格上的淡泊豁然。也正因此，曾为国民政府总统顾问的商衍鎰后来会因为对国民政府失望而辞职，情愿靠卖字为生；而曾被邀请去做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商承祚也选择了当学者不当官。

商衍鎰：中国最后一位探花郎

商衍鎰生于同治十三年(1875年)，字藻亭，号又章、冕臣，晚年号康乐老人。他一出生就和哥哥商衍瀛一样被考场失意的父亲寄予厚望。年幼的商衍鎰也勤奋好学，6岁就读于父亲专门打造的玉莲园书塾，14岁后先后入学海堂、菊坡精舍、应元书院。商衍鎰与哥哥终日苦读，文才出众，颇负盛名。17岁中秀才，21岁中举人，在光绪三十年(1904年)的科举考试中一举取得甲辰科中一甲第三名，即探花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入进士馆。
政治思想开明提出改革主张

为了改革清廷的一些积弊，商衍鎰曾与翰林院成员一起被派往日本留学考察明治维新的状况。虽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影响，但商衍鎰思想并不僵化，他政治思想开明，在日本与康有为、沈钧儒交善，回国后主张变法自强，并向清廷提出改革的建议，可惜未被采纳。

当孙中山等改革人士推翻满清时期，商衍鎰也意识到封建制度必然走向灭亡，民主革命不可抗拒的现实。他赞成建立共和政体，并在国

民政府里担任国民党总统顾问，后任财政部秘书、江西省财政特派员。

商衍鎰性格正直，品德高尚。任职期间，曾建议财政部修改其中不恰当的条文，打击奸商。此事为逐利的商人所知，多次托人说项，说如能将其条文按他们的利益改动一下，将送酬金5万元。商衍鎰不为重金所动，严词拒绝，一时传为美谈。

1927年后，国民政府时政腐败加剧，帝国主义侵略步步紧逼，商衍鎰再看不到国民政府的希望，于是愤然辞职。辞职后，一度是财政部秘书的他却生活艰难，难以维持生计，只能在路上以卖文鬻字为生。然而，他却教育子女，为人在世不应追求虚名，应该以治学为本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。

成为德国传播汉学第一人

商衍鎰不喜做官，对教育事业却是有着热情。他在1912年曾赴德国汉堡殖民学院(后成为汉堡大学)东亚系教中文。那时候，德国海外商务学院来华招聘汉语教授，连一句德语都不懂的他带着两个幼子商承祖、商承祚毅然前往德国，成为德国传播汉学的开拓者。
在德国，他帮助筹建了汉堡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化系，创立了德国第一间汉学研究中心。汉堡大学非常重视这项工作，专门拨出二万马克。商衍鎰编制了采购的中文书目，并向国内订购了一批很有价值的中国图书，成为奠定汉堡大学汉语系基础的里程碑。目前拥有八万余册的汉堡大学中文系图书馆，已经成为德国规模最大和最著名的图书馆。
著名汉学家奥托·福兰阁曾评价商衍鎰“拥有非凡的学习能力和对科学问题的全心奉献精神”。就这样，“末代探花”商衍鎰为促进中德文化教育的交流立下了“首创”之功。
1949年解放后，年过七旬的商衍鎰感到安

慰，在日记中感叹“政治修明，人民鼓舞，余感动欢欣”。此外，他还以87岁的高龄整理自己自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诗书画。“诗以言志重在抒发，一己之性情”，商衍鎰诗风清新自然，情感真挚。同样的，他的书法秀劲超脱，天骨开张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商衍鎰的墨竹画也是不凡，极具内涵。因此，商衍鎰也被后人称为诗书画三绝。

商衍瀛：殉道殉身的前清旧臣

商衍瀛是商廷焕的长子，生于同治十年，字云亭，号蕴汀。商氏家族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弟弟的成绩和名气似乎比哥哥还响亮。商廷焕终身一穷秀才，而弟弟商廷修中进士；同样，商衍瀛中进士，而弟弟商衍鎰考取了探花。弟弟“中国最后一个探花”的光芒似乎盖过了商衍瀛的部分光芒。
年少当家 教书读书两不误

作为商廷焕的长子，商衍瀛身上肩负了最重的责任和期待。他年幼读书，十岁就学会了作诗，十二岁时就熟读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等书籍。1887年，明德公商廷焕病倒去世，从此年仅17岁的商衍瀛不仅要继续求学，还要肩负起家庭里的重任。因为家贫，商衍瀛就一边读书，一边在广州的书塾里教书，一个月能拿到4元支持家用；同时作为哥哥，他还要辅导帮助弟弟学习。

1903年，商衍瀛与弟弟商衍鎰一同上京同应会试，商衍瀛中进士，钦点翰林院庶吉士，而弟弟三甲未入继续回家苦读。这时候，有了翰林院的俸禄，商氏兄弟的生活才相对好一点。

建立大学分科教育 全力慈善救灾活动

1908年，清政府希望改革学堂，商衍瀛被派日本考察大学学制，以准备建立新的大学分科。

其实早在10年前，京师大学堂已经成立了，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分科。等到商衍瀛任京师大学堂预科监督时，他接过这一重任，赴日本考察，回国后全心投入学校规章制度、宿舍建设、制定学科的工作中，很快建立起大学分科教育体系。

辛亥革命爆发后，翰林院被裁撤，商衍瀛失望而去。其间，他目睹了袁世凯称帝一些复辟运动的失败。商衍瀛是忠诚和正直的，恪守着自己最初的选择，后来还帮助傅仪委派处理内务府事宜。

1929年，天津冰灾，商衍瀛出任天津红十字会名誉会长，牵头设立难民收容所五处。1930年，陕西旱灾，商衍瀛又冲往陕西赈灾，为了筹集资金，他把自己冬天多需要穿的全部皮衣都拿出来变卖，变卖的钱用于赈灾。后来，商衍瀛又在陕西建立灾童教养院，收容教育灾童。此外，商衍瀛还建立一个怀幼村，让长大后的灾童有地方回去耕种。

揭露日本统治集团侵略野心

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商衍瀛对国家不能振奋图强而痛心疾首，他深刻揭露日本统治集团的侵略野心：东洋明治维新，更用同文同种之言以掩饰其野心阴谋之恶。对时事失望，商衍瀛以老请辞。辞职后，他专注于社会慈善活动，还任红十字会副会长，尽自己的能力接济在日本侵略下流离失所的难民和当地贫苦百姓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周恩来总理也亲自接见商衍瀛，并派工作人员多次上门慰问，希望商衍瀛能够进入中央文史馆工作。商衍瀛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著述了有关清史。作为前清旧臣，商衍瀛始终恪守着自己最初的选择，竭忠尽智。他临终的《垂暮自题》概括了自己的一生：殉道殉身衷一是，唯从初念见其真。杀人机发天反复，直道心存动鬼神。稚柏能安冰刺骨，贞松宁畏麝成尘。纷纷成败归元理，定论留将后世人。（摘自人民网）

北宋老干部定期聚会

司马光撰写会约提倡节俭

北宋元丰五年(1082)，宰相富弼退休后闲居洛阳，好友文彦博时任洛阳留守。一次，富弼向文彦博提议，由二人牵头，组织一些年龄相仿、资历相当、性情相投、口碑良好的老领导，仿唐代白居易“香山九老会”形式，置酒相乐，定期聚餐。文彦博非常赞同富弼的提议，一拍即合。于是，他们组织当时居住于洛阳的部分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老领导，按年龄为序，轮流做东，时人称之为“洛阳耆英会”。

聚会确定了“老而贤者”十二人。这十二人中，官位最显为富弼和文彦博，均出任过宰相。年龄最大为富弼，七十九岁，其次是文彦博，七十七岁。时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的司马光年龄最小，“年仅”六十四岁，按要是不能进入这支队伍的，但因他声望高、学问好、人缘不错，又正好在洛阳居住，便被“强拉入伙”，成为“耆英会”中的老么。

尽管只是几位老领导的小聚会，但大家毕竟都是当朝叱咤风云、指点江山的人物，无规矩不成方圆，凡事不能草草。经过合议，决定由任过皇帝秘书的大笔杆子司马光执笔，撰写《洛阳耆英会序》，以纪其事。司马光又撰《会约》，给聚会定规矩、作约束。《会约》一共八条，篇幅不长，原收于《司马氏源流集略》一书，现据邓广铭先生《宋史十讲》全文转引如下：

一、序齿不序官；二、为具务简素；三、朝夕食不过五味，菜果脯醢之类，共不过二十器；四、酒巡无算，深浅自斟，主人不动，客亦不辞；五、逐巡无下酒时，作菜羹不禁；六、召客共用一简，客注可否于字下，不别作简；七、会日早起，不待速；八、右有违约者，每事罚一巨觥。

《会约》逐条的大致意思是：

聚餐中只论年龄长幼，不论职务高低，没有官场俗套，大家都轻松；聚餐时，要求餐具简朴，不得金碗银筷讲排场；主人请客时，每顿主菜不

得超过五种，或许就是早期的“四菜一汤”。至于佐酒的果脯、肉酱之类的小碟，总数不得超过二十碟，类似于今天餐桌上的冷盘，看似多，但品种极普通，非难寻珍馐，量亦很少；座次按年龄排，酒壶按顺序递，倒多倒少、饮多饮少自便，东道主不得强行劝酒，宾客也无须勉强自己，量尽兴，量少随意；酒尚未喝完，桌上菜肴却已一扫而光，此时可补充一些菜汤；节约纸张，简化程序，轮到谁请客，东道主只用一张通知单，下列诸客的字，如文彦博只写宽夫，司马光只写君实。派人逐家传递，客人是否能出席，只需在字下签注即可；聚餐之日，客人要按时出席，不等不催；上述规定，谁若违反，如迟到、答应来而不来、主菜超过“四菜一汤”等等，无论主宾，违反一条，即罚酒一大杯。

有了这么一则《会约》，人们在请客的过程中，均按约办理，减少了身不由己的铺张，杜绝了竞相斗富的攀比，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，主人没有压力和负担，客人也绝无轻视和鄙薄，优游自如。

《会约》把餐具的标准、菜肴的数量、请帖的呈送都规定得详详细细，节约到连请帖都不准多发一张，可谓节俭至极。司马光做官多年，待遇丰厚，却始终恶衣疏食，他常说：“食不敢常有肉，衣不敢纯有帛”，一直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。当时，他居住洛阳，正埋头创作《资治通鉴》，前后整整十年，由于住宅低矮破败，夏天酷暑难当时，只好在房子下挖一个地下室，穴居期间，寒砭而又另类，被人讥笑为“穴处者”。

《会约》体现了司马光的节俭美德，对豪华相尚、俭陋相誉的北宋官场的奢靡之风，是一种自觉抵制。按约请客吃饭，既能体现东道主的好客之道，又不会捉襟见肘，让人打肿脸充胖子，逼得东道主寅吃卯粮，违心操办，甚至负债操办。（摘自人民网）

曹操设摸金校尉专司盗墓取财

民国盗墓贼叫土夫子

近来，电影《鬼吹灯之寻龙诀》很火爆，关于盗墓贼的话题飙升，电影中的盗墓贼有一个官味十足的别称“摸金校尉”。其实，这个“摸金校尉”在历史上是一个官衔。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弥补军饷的不足，曾专门设立发丘中郎将、摸金校尉等军衔，专司盗墓取财，贴补军用。而在民国时盗墓贼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别称——“土夫子”。

据《满洲絮语》一书载：“土夫子”本来是民国时长沙对卖黄泥土为生者的俗称。因为在当时的湖南长沙城里，老百姓都是以烧煤炭为主，而煤炭里面需要放黄泥土，以此来增加耐烧度，故而对黄泥土的需求极大，于是就诞生了以拖着板车卖黄泥土为生的一种职业“土夫子”。这种行业多以男性壮劳力为主，他们出身贫贱，经常到郊区附近的山丘挖取黄泥土，卖给市区的酒家或居民。做煤用的黄泥需要纯净的黏土，俗称糯米泥，是黄泥土中的上品；一般的老土俗称朱甲土，缺乏粘性不适用。而这种纯净的粘土以古墓墓坑的回填土为最佳，很多“土夫子”就去墓葬所在地挖取黄泥土。最初由于偶然的机会有人在山丘下坡的唐宋时期墓坑内挖黄泥，意外地挖到一些釉陶器或白瓷碗、碟等随葬物，就带回家中洗净作为用具，但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文物。

那时，长沙有些走街串巷、收买古玩和玉器的小商贩，这些人对文物略有知识，看到“土夫子”家里的古陶瓷就想收买。“土夫子”故意吹嘘说：“这是宝器，三伏天盛菜不会馊，我不卖。”小商贩说：“哪有这样的怪事，这些土里挖出来的东西是古代陪葬用的，卖给我，多出钱。”“土夫子”听到多出钱就动了心，于是信口开价，双方在讨价还价之后就成交了。这时，“土夫子”尝到了甜头，心里盘算辛辛苦苦挖了一天黄泥，只能换得几升米，而挖到一

只古瓷碗却能赚几块光洋，真是“费力不赚钱，赚钱不费力”。从此以后，他们便不以卖黄泥来谋生，而以盗掘古墓的文物为职业，这样就在长沙出现了一批“土夫子”，并且在东、南、北区形成了盗墓团伙。于是，“土夫子”就成了盗墓者的诨名。

由于“土夫子”经常盗掘古墓，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墓葬封土和填土的特征，逐渐有了很强的识别能力，只要用锄头透过地表浮土取出样土来观察，就能鉴别是哪个朝代的墓葬，然后挖成竖井式盗洞，从墓中取出文物，因此百挖百中，从不落空。他们所盗的文物无奇不有，除陶瓷器之外，还有铜器、玉器、琉璃器以及漆木器等。此时，不仅是收古玩珠宝的小商贩常来常往，一些有名的古董商如蔡季襄也成了“土夫子”的大主顾，生意越做越大，成交一次，少则光洋几十多则上千。“土夫子”的所作所为，致使新中国成立前长沙的古墓遭到严重破坏，大量的珍贵文物流失。其中国宝“战国帛书”，就是“土夫子”在长沙市南区一座楚墓中所盗，为蔡季襄所得，后被原雅礼中学的美籍教师柯克斯所骗走，现流失在美国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鉴于这些“土夫子”精湛的技术，当时的文管会就聘请了当中个别优秀者当了发掘工人。他们的“土”办法，为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了很大方便，被称为“土专家”。观察样土判断古墓的深浅和年代，是“土夫子”的特长之一。尤其是在长沙汉墓的科学发掘中，他们指路引线，免去了诸多不便。据说马王堆汉墓发掘时其千年女尸在棺内难以取出，就是“土夫子”们出主意用五块木板斜插进去，将棺侧起，谨慎将女尸取出，因此而得以保存。（摘自人民网）

责任编辑	张维峰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